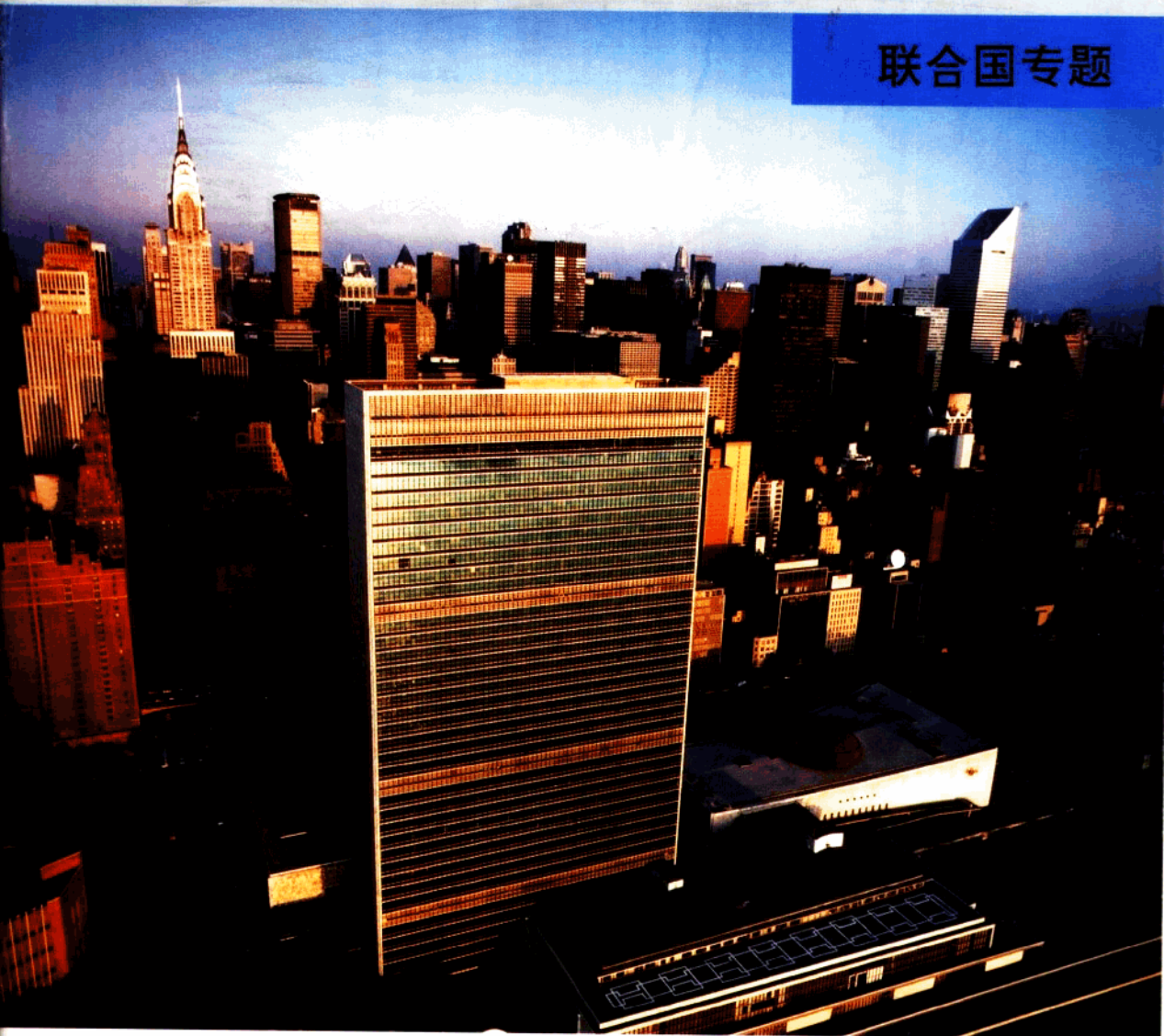


Deutschland CH

联合国专题



德国在
联合国

以更大的
责任感
塑造联合国
的未来

发展援助者与
和平创造者

国际社会
多种多样的
任务、问题
和机遇



采访：
联邦外交部长
克劳斯·金克尔
谈安理会的改革

第4页:

无休止的外交
活动:

全体大会

第8页:

新时代,新思想:
德国在联合国
的作用

第12页:

联合国在全世界
范围内:当前的
和平使命

第14页:

权力与无能:
安全理事会

第17页:

领导人:
联合国中
的德国人

第18页:

在发展中:
作为南北中心的
联合国城市波恩

第20页:

理想与职责:采访
外交部长克劳斯·
金克尔博士

第23页:

世界互联网络:
联合国联网



从战争同盟 至和平组织: 联合国历史的 各个阶段

1945年6月26日, 50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其宗旨是: 维护世界和平。在第二条中, 各成员国承担放弃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的义务(图1)。



联合国第一届全体大会于1946年1月10日在伦敦召开。参加大会的有51个国家(图2)。特吕格维·李(挪威)为第一任秘书长。

1956年11月6日全体大会决定派遣和平部队至中东调解苏彝士危机。联合国应急部队(UNEF)是联合国的第一支和平部队(图3)。

1973年9月18日: 第28届联合国大会同意接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民德为第133和第134个成员国。一天后, 联邦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图4)作为德国政府在纽约的第一个代表向全体大会发表演说。



1995年10月底, 联合国举行各国首脑全体会议庆祝成立50周年(图5)。小结: 35次以上和平与观察使命以及170多次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议定使地区性的冲突得以抑止或(暂时)结束。



同这个 世界组织 团结一致

在联合国宪章签订后51年的今天，德国是国际大家庭中一个受尊敬的伙伴。在重新统一的6年之后，德国正在对加强这个世界组织作出巨大贡献。我们以此促进捍卫人权以及摆脱恐惧和匮乏。我们和我们的伙伴们一起支持这个世界组织为了和平和国际安全所作的努力。例如，德国往原南斯拉夫派遣了大约3 600名士兵参加了北约武装力量在维和部队范围内在国外的投入活动。来自这个冲突地区的320 000多个难民在德国受到了接纳，并得到了保护，不再受暴力、饥谨和贫困之害。

联合国要完成其任务，它就理应得到我们的支持。因此，德国积极地参加为改革付出的种种努力。这方面包括可望更具实效以及保证各大洲代表性更为广泛的新安全理事会新结构。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个要求得到了许多成员国的支持。

联合国也必须整顿其财政。所有成员国都应该一像德国一样一定期和如数地缴纳其会费。长期以来，德国就负担了一般预算的9.04%，是第三大缴纳会费国。

德国在联合国系统中正在增长的作用为世所公认。我们非常欢迎各种国际会议和机构。我赞同国际海洋法庭迁址汉堡。拥有第一流设备的波恩市最为适合作为联合国机构的所在地。

联合国并不总能跟得上它的宪章的允诺。但是，这个世界组织只能像它的成员将它塑造的那样强大。这是政治意志的问题。联合国可以继续指望得到德国的积极配合。



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博士





东河畔 外交渠道 种种

全体大会场外 花絮

托马斯·舒勒尔

星期一，9月30日。德国驻联合国大使托诺·艾特尔将他的以色列同行陪至德国驻联合国使团门口时，时钟指向18点。在其来访后，大使在41层楼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将近半小时的采访，然后被邀请同美国女大使共进晚餐。从他的办公室里可以眺望城市闹区曼哈顿、岛屿南端世界商业中心的两座塔楼以及两条河流——东河及哈得孙河。

**9月份最后一周内
全世界都注视着纽约**

但是，在最近的几天里，艾特尔可没功夫观景：185个成员国的160个国家的总统和外长前来纽约参加全体大会开幕式。虽然年年如此已成惯例，9月份的最后一个月却是一年中最紧张的几天。每天从9点至23点连轴转。

这会儿国家首脑和外长们对这座城市又不予理睬了，在曼哈顿中区的德国驻联合国代表处开始了第51次全体大会的日常工作。这就是说：日复一日地阅读和分析其他代表团的演说；准备自己演说的第一、第二、第三稿；每天的会议、首先在使团内部，然后同欧盟成员，然后在安理会和全体大会的各委员会中。此外再加上为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德国成为联合国其他机构的所在地进行外交游说。

联合国全体大会的作用如同弗洛伊德的一张长沙发椅，艾特尔大使说：“人们到这儿来，为自己开脱。部长们走向话筒，向世界报告那些引起他们关心的事情。他们有把握，185个代表团当中至少有160个要记录下来向家里汇报的。这是除了这里哪儿也没有的乘法效果。”

如果谁有时候觉得这些指导太官样文章，他就应该想到一点，艾特尔说：“在纽约，话是为外长们，

而不是为家里的报纸读者说的。”艾特尔谈到“国家之间的交往”，他说：“公众在这里是第二位的，甚至是第三位的。”





这里要紧的是，热情洋溢和令人信服地使其他国家了解你认为重要的事情。”

联合国的外交秘密之一是其实有“两个”全体大会。乍一听这让人感到迷惑不解，首先是因为两者是同时进行的。政府首脑和部长们不是为了圆形大厅里的大会才到纽约来的。真正重要的大会的地点和时间在部长们的记事日历里，而碰头会是在联合国秘书处地下室的小房间里、在欧洲联盟的会议室里、在联合国广场大酒店华丽的套间里和在瓦尔



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在代表团餐厅的冷餐台旁，有时候也在大街拐角处的J's烤肉店里举行的。

倒叙：9月22日、星期日、19点。在离联合国不到两分钟的步行路程的一家爱尔兰的小酒馆—J's烤肉店里，安排了克劳斯·金克尔外长的首次新闻发布会。大约40名德国记者到场。外长前面放着一份文件夹，他列述了最近几天的主题：这个世界组织的财政状况、美国对秘书长连任的否决、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字、他同伊朗和中国的小心翼翼的会谈—和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金克尔说，对德国的支持是广泛的，但是问题在于其他国家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他的候选国未取得一致意见。

9月23日，星期一：金克尔从9点钟开始在联合国广场大酒店28层

楼他的套间里先后接见加拿大和哥伦比亚的外长。10点45分他穿过大街前往联合国秘书处，同他的埃及同行会谈，然后（又在广场大酒店）会见南斯拉夫外长。

德国外长每天有10个、12个这样的日程，无论是在全体大会主席那里，还是在秘书长那里。几乎同样重要的是邀请午餐、晚餐和参加招待会，只要有机会未被觉察地谈论棘手的问题。此外还有欧盟外长同其他地区外长们的碰头会。金克尔必须同所有的人谈话。在联合国，小的

成员国的票数和大成员国的票数是同样作数的。如果金克尔有朝一日不到纽约来，德国在那里就无人代表，因为这些邀请只发给国家首



脑或部长本人。“如果部长想不到纽约来进行这些会谈，那么他就得在全世界各处转半年”，艾特尔大使说。

在同秘书长共进午餐时，金克尔还会见了第51次全体大会主席，马来西亚驻联合国大使伊斯梅尔·拉查利。金克尔在晚间想告知记者的是，拉查利以他的大刀阔斧的方式和自信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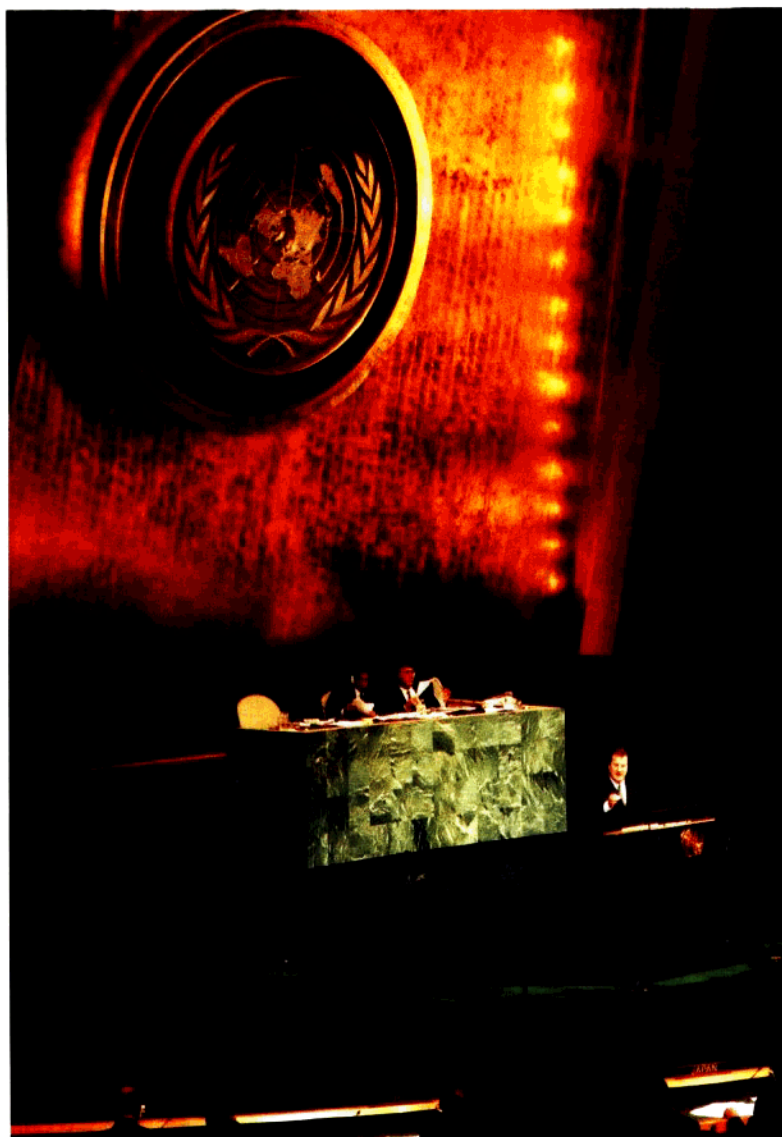
部长的工作人员制伏信息洪流

下午以45分钟间隔的节拍继续进行会谈。所有这些信息如何掌握呢？哪儿来的时间去整理和分析它们呢？金克尔为此从外交部带到纽约来的工作人员就有40名之多。

9月24日，星期二：克林顿总统来到该市。联合国四周的街道无一



马不停蹄：在全体大会期间，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左）和托诺·艾特尔大使没有丝毫清闲的时间



东河畔 外交渠道 种种

人。处处封锁：身着深色上衣的保卫服务人员在屋顶上埋伏着；秘书处前停着一排排带有电视台卫星天线的转播车。像克林顿发表演说时的空前盛况要到美国总统下次来访时才会再次出现。当日的成果是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条约并不像名称那样给人以全面的印象，然而令人惊讶的还是，持有许多不同意见的185个成员国压根儿能作出共同的决定。仅在全体大会上及其6个委员会中，外交家

们就不得不局限于宣读书面表态——这是外交礼仪的规定。

在这里提供帮助的有“主席之友”、“危地马拉之友”、“好心人”、“芬奇小组”或者有时候也称作6人小组、24人小组或27人小组的“77国小组”。名称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外交家们特别喜欢用首字母缩略词和数字组合。

在品尝香肠和酸菜 时联系就建立起来了

在1946年首次举行全体大会时，阵营并不分明。从1947年开始直至60年代，也就只有两大国家集团的对垒。从接纳了许多小的、往往是非殖民主义化的国家起，成分变得丰富多彩起来。60年代初出现了不结盟运动。除了政治派别外，还形成了地区派别、利益集团和主题团体。“主席之友”可能是协助全体大会主席起草决议的若干外交家。“77国小组”如今是加上中国在内的131个发展中国家，“危地马拉之友”是支持在这个中美国家和平进程的极少数国家的观察员。而德国则在为原南斯拉夫成立的“联络组”以及在“格鲁吉亚之友”小组中活动。

9月25日，星期三：今天克劳斯·金克尔外长要发表演说。事先他应邀与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团共进早餐。在去全体大会的路上，他在联合国所在地偏北的一处建筑工地稍作停留。到1998年这里要建成一座容纳从总领事馆直至德国信息中心和联合国使团的德国驻纽约所有代表处的23层大楼。金克尔站到建筑工人中间，兴致勃勃地摆好了姿势照相——尽管迄今为止为争取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谈判是紧张而艰难的，但是为了在纽约德国起更大作用的新住所已明显地初具规模。最底下的三层已经起来了。

9月26日，星期四，18点30分：数百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和使馆代表应部长邀请来到代表团餐厅。在走廊里，联合国的官员们和记者们一整天都在谈论德国部长每年在行

李中必备的“香肠和酸菜”了。这是建立联系的最舒适的方式。两小时后最后一批客人莅临时，克劳斯·金克尔已经在对面的联合国广场大酒店29层楼同他的法国同行埃尔维·德·夏莱德共进晚餐了。部长这一周的活动当然和联合国的日常外交没有多大关系。谁想见见日常外交的场面，就得在白天去瞅一眼就在全体会议圆形大厅隔壁的代表团休息室。房间大如火车站的大厅，不同的是柔软的地毯地

秘密：在没有宣读、没有对此表决以及最后打印出来之前是什么也不算数。这些文件既无抬头地址，也没有作者姓氏，但是人人都在谈论它，谁都清楚地知道，这句话是“俄罗斯写进去的”，那个提法出自法国人的手笔。有些决议搞了几个星期。每人都参加一点意见，不知什么时候也许冒出一份新的、第二个“非文件”。比内容更重要的常常是纯粹参加措词，因为达成的默契是：谁参与起草一份决议，就也得一起遵守——并且（但愿）也得为其实施掏腰包。

9月27日，星期五：今天金克尔想向记者们介绍一位不速之客。在两小时之内德国驻联合国使团提供如下“最新”信息：举行会晤。它被取消了。不，它还是要举

行的。对不起，会晤不得不取消。也许会晤还是要举行的。激动的原因是：克劳斯·金克尔由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必须马上到安理会去。理事会召开部长级会议，大厅里拥挤不堪。



在主席午间中断大会后的几分钟，带有蓝色闪光灯的豪华大型轿车在一号林荫道上风驰电掣般地朝黑人居住区开去。美国驻联合国女大使玛德莲娜·阿尔布莱特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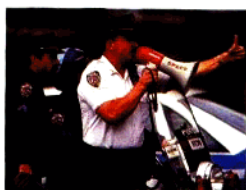
从安理会到黑人居住区去进晚餐

那里的一家名叫Silvia's的著名饭店。克劳斯·金克尔和一群记者已经在等候着这位联合国最有影响的女外交家。结果还是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这位不速之客。

“秘密外交”有助于准备决议

乎隐藏在一张6米长的柜台后面——两名联合国公务员，不断地替代表们接电话，然后转接给20组铺着软垫的座位的电话机子。“尼日利亚的代表，请接电话！...的代表...”这里的常客是使馆离得较远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但是，安理会的成员以及所有那些经济和政治上重要的国家的代表也害怕休息室里的小型“突然袭击”：这里人们彬彬有礼地（“我可以请您喝一杯咖啡吗？”）向一位先生或一位女士送上一杯或一份“非文件”。

“非文件”是原来根本不存在的文件。联合国外交界还有一个小小的



面向世界：在全体大会期间，外交家们在纽约建立的联系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



以新的目标跨入 下一个千年世纪

德国在联合国 改革中的作用

格雷戈尔·舍尔根

新的时代要求新的思想：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旧的世界制度的崩溃必然也给这个阶段中发展和建立起来的那些机构和组织带来了一场危机。它们都在很大的程度上适应了冷战的特殊结构，因为唯有如此它们方能有助于稳定的出现。由于核恐怖的产生，这种稳定最迟从1961/62年以来，也就是从柏林和古巴的大危机以来被各方视为最高的政治要求。这至少适合于北半球的情况。对北半球来说，那个制度首先是臆造出来的，并且无疑地在那里经受住了

考验。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些结构以及为这些结构创建的国际组织为自己阐明的两极中的一极如今已然消失。

改革的推动力来自 旧制度的解体

这样看来，“华沙条约”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冷战临终时刻的解体实属顺理成章。其他组织，例如“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或者还有欧洲共同体，从旧制度的解体中获得了进行自身

改革的决定性推动。

这方面部分涉及到未曾预料的措施，如现在讨论的，在1991年以前不可思议的北约“东扩”问题，但是部分地也涉及加速进行早已考虑到的计划，例如在马斯特里赫特进程中将欧洲共同体导向欧洲联盟。

“东扩”——在1991年之前
尚属不可思议

最终还有几个国际组织面临着相应的变革。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虽然技术上已改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仍有待于实际的改革。首当其冲的是联合国。欧安组织和联合国这两个组织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几乎一夜之间使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数目大增。在两种情况下，同时空缺的只有一个席位：1990年德国的统一恰恰是这种类型的与冷战结束时不仅在中东欧、东南欧和东欧，而且也在例如非洲角等世界其他地方可以



观察到的国家衰亡的普遍趋势相反的唯一结果。

在联合国改革过程中的特殊责任

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德国在联合国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就承担了特殊的责任。其他的因素各有其分量：例如，没有第二个国家像直接位于东西方冲突的交接处的被分裂的德国这样感谢过去几十年的和平发展。

这些国际组织是这一发展的重要保障。没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这些共同体中以及从1973年9月以来也在联合国中的牢固联系，德国的统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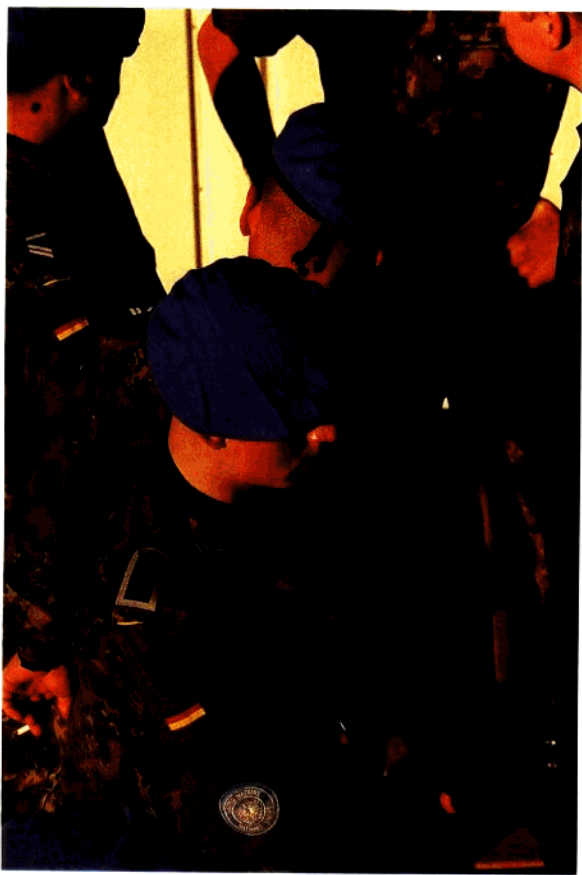
但是，联合国的成立直接归结于1941年至1945年德国的政策以及进行的战争。因为，确切地说，1945年6月26日在旧金山问世的联合国不外是在1941年下半年形成的、由苏联、英国、美国以及后来还有法国构成其核心的那个“反希特勒联盟”的继续、扩大和机构化。

1941年8月14日，即还在美国参战前，由弗兰克林·D·罗斯福和温斯顿·邱吉尔签订的“大西洋宪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反希特勒联盟”的出生证明，而对德国的宣战则是为了能在1945年4月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前提条

件之一。

甚至一直到“反希特勒联盟”正式终止，即直至1991年的“二加四”条约生效，第53条和第107条，联合国宪章所谓的敌对国家条款仍然是有效的。这些条款原则上给了当时战胜德国的国家在发生危险

1991年成为那个联盟瓦解的推动力；当3月15日最后的一份，即苏联批准书提交后，“二加四”条约生效，“反希特勒联盟”也随之正式不复存在。从此以后，对德国在联合国的作用的期待与日俱增，就绝非偶然了。



对紧迫的实质问题的迅速答复

人们的希望也涉及联邦德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活动。然而，由于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的框架条件，某些观察家感到开头谈到的这个改革计划简直是毫无前途的冒险行为。因此，较长时间以来也有赞成完全重建这个世界组织，即在一定程度上赞成这个国际社会进入第三轮的严肃认真的呼声：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联盟以及冷战时期的联合国之后，人们关心的是有一个能考虑到新时代的种种挑战的机构。但是，除了如今也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内的主要活动家们的此类解决办法无法获得多数外，联合国改革可能性还根本没有竭尽。然而，目前这个组织的改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使改革措施不仅

时为了德国的和平进行干预的权利。

德国问题作为联合国的基石

肯定的是，由于1945/49年以来世界政治的发展，此类规定首先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它们表明，正因为如此，德国问题在联合国成立过程中具有何种地位价值。和德国发动战争对1941年“反希特勒联盟”的成立以及后来联合国的成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样，德国问题在

仅局限于结构。

肯定的是，没有这方面的改建是不行的，而在其他地方还要谈到的安理会的改革（见“大国竞赛中的裁判员”一文，第14—16页）也包括在内。在此期间，对这个世界组织面临的实质性问题有说服力和迅速的答复即使不是重要得多，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其原因有二：其一，从1995年11月28日至1996年9月13日由“务虚工作组”召开的关于安理会改革的39次正式的和17次非正式的会议表明，这个题目是多么艰难，多么微妙。

从1992年起，德国士兵参加联合国在柬埔寨、索马里、伊拉克、原南斯拉夫以及格鲁吉亚的投入活动

在紧迫性问题上取得的成果也可能导致对这个计划的积极的反作用。但是，那样的话，安理会的结构改革直接涉及到的就仅仅是几个国家而已。

在实质性问题或对联合国的行为目的重新下定义就不一样了。它或多或少地直接涉及所有国家，首先是始终为多数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

但是，这个国际社会在跨入21世纪时给自己提出了哪些问题呢？可以肯定的是，涉及过去时期的传统安全问题的情况越来越少。当然，谴责化学武器或禁止核武器试验仍然首先是这个世界性组织的真正事务。

从安理会的问题到 南北之间的难题

冷战时期联合国主要关心的是另外的事情。当时的任务是避免原先结盟反对希特勒、在制服德国以后互相挑衅的各大国之间发生第三次一热的一世界大战。今天已经不再提出这样的任务了。

其他的例如裁军等传统安全问题，过去和现在通常总归是双边或多边地，即由被涉及的国家自己谈判解决。过去和现在，在裁减欧洲常规武装力量以及在减少苏联的或俄罗斯的和美国的战略核武器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最后由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一再明确地声明，今后绝不将其武装力量置于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其他的命令之下。这一点也说明了联合国在传统的安问题上原则上少操心的原因。

而其他的一些在冷战期间尚未或至少未曾以这种方式如此强调提出过的，并非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集体或一个洲所能解决的问题却引起了普遍重视。这也就是一个

经过改革的世界性组织的新任务。

国际社会面临 新的挑战

这方面包括其后果是例如大规模迁移的南北之间的明显对立；国际刑事犯罪以及全球性恐怖主义的



新的形式、方法和首先是新的对象；污染着世界上大片地区的过去时期的军事遗留物如巨大的核潜力或数量巨大的地雷；席卷全球和最明显地表现在建立一个彻头彻尾的电讯和信息社会之中的技术革命；全世界范围内金融市场的联网以及企业活动的全球化及其越来越缺乏抵抗力；群体社会的贪婪与陋俗；环境的变形以及也许是特别紧迫的问题：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越来越紧缺。

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是，这些紧迫性的问题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以

单独地解决的。它们多半是互为因果的。南半球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些问题在那里特别表现得盘根错节，以及因为恰恰是“第三世界”几乎不具备合适的解决手段。

联合国，从而也是它的富裕成员国，由于多种原因，将来在那里要比迄今为止更加积极地开展活动；原因之一是，从长远来看，如果“远近邻居”不这样做，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地方能生活在和平之中——1935年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谈及欧洲安全时曾这样强调指出过。

今天的情况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是如此，因为世界由于全球化以及各个生活领域的打成一片不得不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整体，而安全问题却越来越少地被限制在军事范围内；污染像国际恐怖主义或犯法的原子废料的贸易一样，都不是在国境上就停住的。

受到富裕国家注目 的“第三世界”

归根结底，“第三世界”确切地说是过去时期的产物。传统的殖民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在冷战后得以幸存的。冷战就这样，

从表面上看通过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的一个席位，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给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国家带来了国家的独立。

但是，过去的半个世纪同时也正是要求这些国家在无数的危机和灾难中偿还一笔巨大的代价。在东西方对立时代，它们必然要适应这个对立的逻辑。随着双极世界制度的终止，这一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南半球各国人民不再片面地被利用和被勒索了；它们的问题越来越决定着发生的事件。这种情况只能由各国的共同体来解决。

一个经过改革的世界性组织最重



要任务就在于此，而正是在这件事上德国起着特殊的作用。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德意志帝国在1919年就放弃了它的殖民地。因此，南半球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民须向德国夺回其独立；联邦德国在任何地方也未曾沾染上最后的、野蛮的殖民主的污点。由于德国经济的效率，但也由于其慷慨的避难法，这个存在的局面使统一德国对“第三世界”的人们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必须消除人口 迁移的原因

另一方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必须关心解决紧迫的、在“第三世界”中特别清楚地认识到的未来问题，因为它也由于一系列的原因直接或间接地受此影响：一个极端的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对一个如此依赖于世界经济的国家长久来看是不合适的。因此，消除难民大量流入的原因对德国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人口的大量流入对

一个具有这样幅员和人口密度的国家必然会达到它的自然极限；自然资源越来越紧缺的问题是造成人口迁移的原因之一，必然会特别影响到比任何其他国家都依赖于原料进口的联邦德国；反之，德国将必然关心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因不仅因为它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对此深有体会，而且也因为在环保技术领域里它是世界上领先的国家之一。

尚未可知的是，这些任务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HCR）、世界粮食或环境计划等现有的组织或计划是否就能完成以及这些组织和计划可能还须进行哪些根本性的改革。肯定的是，只有当这些目标被阐明，并从而使任务为人们所认识的时候，这些措施才有意义。

“北大西洋宪章”目标 的落实姗姗来迟

如今也许存在着机遇去落实邱吉

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8月在他们援引的“北大西洋宪章”中拟定的，但是在世界上广大地区成为冷战牺牲品的那些崇高的目标中的几个。不管怎么说，在这份半个多世纪以前签发的后来的联合国的出生证明中也要求，“国无大小”，（...）均应保证其参加世界贸易及获得世界原料（...）的同等条件”以及“创造各民族之间在经济领域里的最充分的合作，旨在为人人保证改善工作条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安全”。

未曾兑现的对社会 安全的要求

对为数众多的国家来说，这始终是未兑现的要求。如果联合国的工作将来具有意义的话，那么，这些要求的落实就必须提到议事日程的最前头才是。

格雷戈尔·舍尔根，生于1952年，埃尔夫根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近代和当代史教授，著有许多历史政治专业书籍。

从建立一座战地医院直至参加战斗投入：德国维和部队的任务是多种多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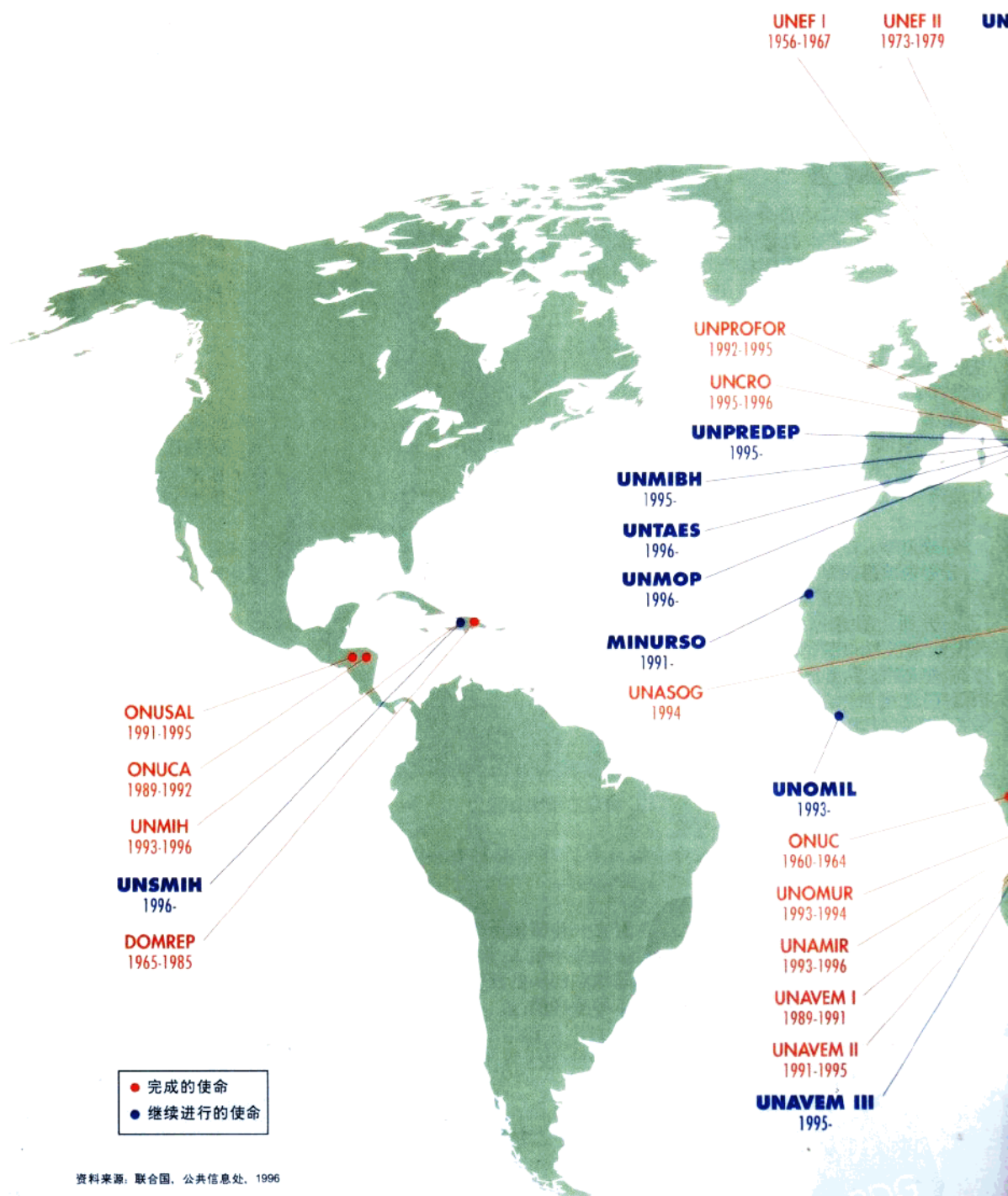
集体安全:

联合国当前的 和平使命

联合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组织。安全理事会对是否通过斡旋调解争端,是否采取例如经济禁运等非军事性措施或是否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等作出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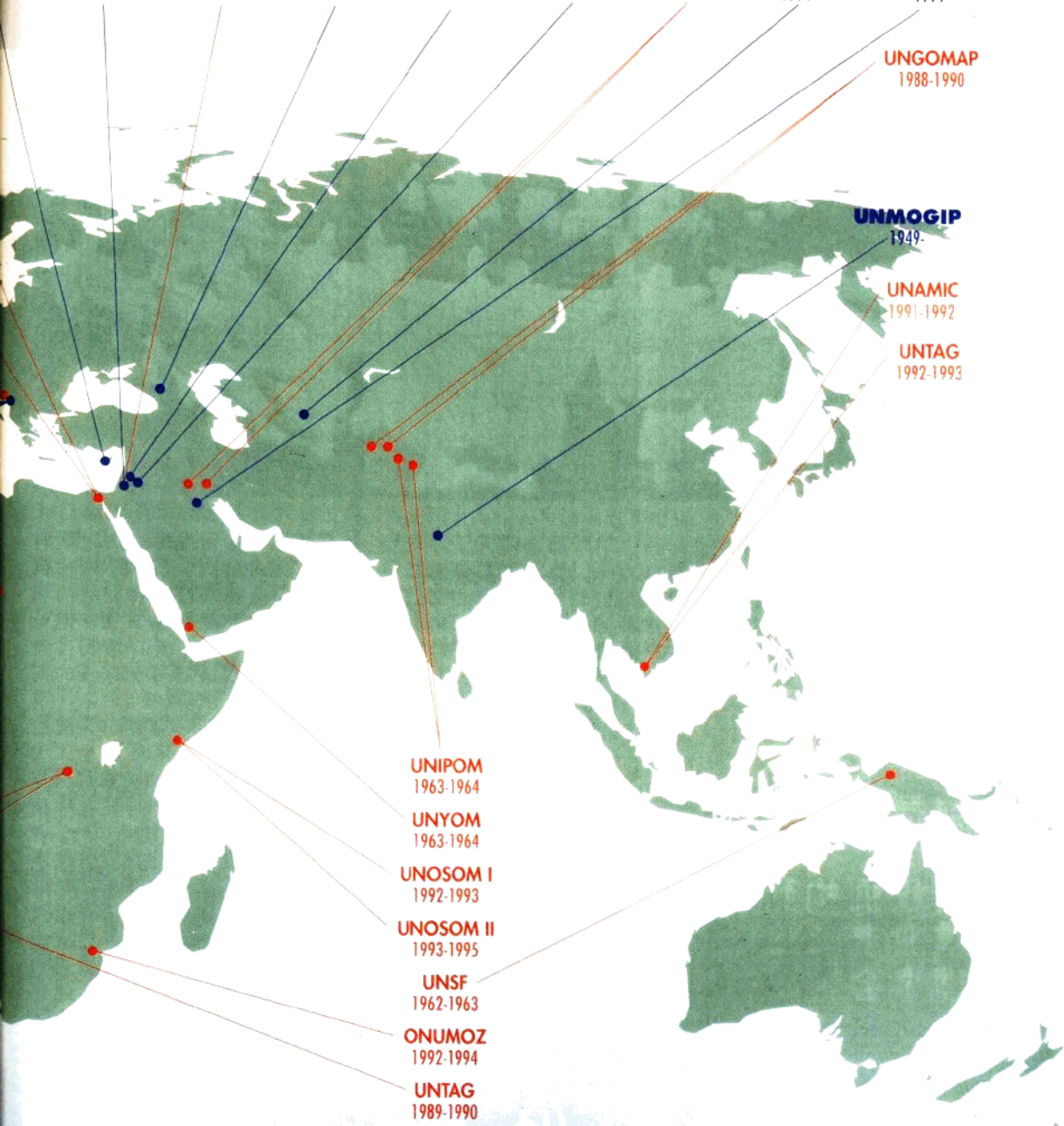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和平使命:其一是创造和平的使命(peace-making

operations),另一种是包括所谓的投入维和部队在内的保障和平使命(peace-keeping operations)。联合国的和平部队—由于其军帽的颜色而被称为蓝盔部队—由成员国的武装部队组成。其投入须由安理会委托。目前维和部队在16个危机发源地投入行动:



- 1948年6月起在巴勒斯坦 (UNTSO)
- 1949年1月起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边界 (UNMOGIP)
- 1964年3月起在塞浦路斯 (UNFICYP)
- 1974年6月起在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地区 (UNDOF)
- 1978年3月起在黎巴嫩 (UNIFIL)
- 1991年4月起在伊拉克和科威特边境 (UNIKOM)
- 1991年4月起在西撒哈拉 (MINURSO)
- 1993年8月起在格鲁吉亚 (UNOMIG)
- 1993年9月起在利比里亚 (UNOMIL)
- 1994年12月起在塔吉克 (UNMOT)
- 1995年2月起在安哥拉 (UNAVEM III)。维和部队7000人，为目前最大的投入
- 1995年3月起在马其顿 (UNPREDEP)
- 1995年12月起在波黑地区 (UNMIBH)
- 1996年1月起在原南斯拉夫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希尔米欧姆等地区 (UNTAES)
- 1996年1月起在普雷夫拉卡半岛上作为在波斯尼亚使命的一部分 (UNMOP)
- 1996年7月起在海地 (UNSMIH)

CYP 4- UNIFIL 1973- UNOGIL 1958 UNOMIG 1993- UNDOF 1974- UNTSO 1948- UNIIMOG 1988-1991 UNMOT 1994- UNIKOM 199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百余次较大的冲突夺走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随着冷战的结束，出现了各国人民和各大洲之间新的伙伴关系的机遇。然而，在原南斯拉夫发生的战争表明，

在东西方对峙结束后天下并未变得更加太平。德国和联合国其他许多成员国的安全未曾受到这些冲突中的哪一次的直接影响。但是，冲突的频繁发生及其总的后果涉及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

德国确信，必须竭尽全力使联合国得以应付时代提出的种种挑战：在安全理事会有待完成的任务方面，在和平行动方面，但是也在解决像贫困、人口增长过快以及环境遭受破坏等全球性的问题方面。

联邦外长克劳斯·金克尔为此在1996年9月联合国第51次全体大会上说：“我们像西西弗斯那样拖上山去的石头看来一再地在往回滚动。这不应该使我们灰心丧气。我们的责任始终是，实现我们在这个世界组织50周年纪念时庄严宣告的目标：捍卫和平以及帮助贫穷匮乏中的人们。建立一个更加太平和更加公正的世界的理想不能丧失。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必须仍然是世界的天良。除了这个机构之外，谁还能照管着使蓄意杀害和刑讯拷问事件不再发生，使难民能获得最必需的供应，使我们的儿童能得到保护和

大国竞赛中的裁判员

从否决权机构到和平的积极捍卫者：安全理事会

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
15个理事国对投入维和
部队一事进行表决

关怀呢？”

为了实现这一要求，德国从1973年加入联合国以来，在1977/78和1987/88年之后，在1995/96这些年里第三次在安理会中承担起了世界政治方面的责任。安理会是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并在联合国的“基本法”——联合国宪章的文本中规定负有“保卫世界和平以及国际安全的主要责任”（第24条）。因此，安理会应该解决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冲突。这首先应该通过和平手段予以实现，例如通过采取调停尝试、调停仲裁法庭，但也通过对破坏和平的国家实行经济的和其他的制裁措施。作为最后手段，也可以考虑投入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

安理会最初只有11个理事国。从1965年起，它由15个国家组成。安理会有5个常任代表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联邦——以及10个所谓的非常任理事国。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每两年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选入安理会。1996年的非常任理事国是德国、意大利、博茨瓦纳、埃及、几内亚比绍、韩国、印度尼西亚、洪都拉斯、智利和波兰。

安全理事会可以作为联合国唯一的机构作出对所有185个会员国有约束力的决定。在安理会中进行表决时，每个理事国各有一票。在对实质问题表决时，至少需要9张赞成票方可，其中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的全部赞成票。这就是说，这些



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有否决权。弃权不作为否决权。

冷战结束以来，安理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这首先是由于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不再像1945年至1989年的这几十年来那样，互相以否决权来钳制对方。到1989年为止，共行使过193次否决权；从1990年起仅4次。

例如1995年是安理会特别繁忙的一年。理事国通过了66项决议，召开正式和非正式会议386次。作一比较：1988年安理会通过决议20项，召开会议117次。

随着90年代初开始安理会重要性的增长，关于该机构改革问题的讨论也增加了。首先是亚、非、拉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以及由于东欧和中亚变革而新产生的国家感到没有被适当地代表。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时只有50个成员国，其中11个是安理会理事国（今天的5个常任理事国和6个非常任理事国）。今天联合国有185个成员国。安理会由15名成员组成。1965年，非常任理事国从6个增加到10个。

德国在关于改革的辩论中认为，较高的成员国数目也必须反映在安理会的组成中。同时，不能拿这个中央机构的威信和办事能力去冒险。因此，德国主张适当地增加安理会中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理事国应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德国认为，安理会的有效的改革还包括工作方法更具透明度和更加民主。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应该能对安理会的意见形成产生影响。清楚的是，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那些为和平行动派遣维和部队的联合国成员国。

德国关于改革的设想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和支

照片：托比亚斯·埃弗尔克(2)，焦点杂志，联合国图片社/E·施奈德，无名氏，图表。



持。多数国家也认为，德国应该在一个改革的安理会中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许多国家感到，由于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作用，尤其是由于它公开宣称的对联合国的支持，它特别适合在安理会中获得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

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讨论尚未结束。目前这个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国家如何能最好地、持久地在安理会中得到维护。

安理会最艰难和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对一次和平行动作出决定。和平行动——这个概念代表了受联合国委托在世界危机发源地为和平事业效劳的士兵、警察和民事人员的投入。他们致力于使炮火沉寂，帮助贯彻已达成协议的和平解决方案。公众最注意的联合国行动莫过于维护和平的措施了。1996年联合国成员国在17次和平行动中平均派遣士兵、警察和军事观察员30 000人。

德国从1973年加入联合国以来参加了17次维和行动。目前德国通过提供材料或派遣士兵、军事观察员和民警以及马耳他战地服务组织工作人员参加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UNMIBH）、

在格鲁吉亚（UNOMIG）的活动以及在伊拉克—科威特的观察使命（UNIKOM）。

由于德国对两次世界大战负责这个背景，在德国对是否应派遣德国维和部队参加联合国和平行动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1994年7月12日，德国的最高法院一设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德国可以根据它的宪法第24条进入互相集体安全体系以及联合国的体系并同意在这方面受其主权约束。因此，德国士兵即使被授权执行军事性强制措施，他们也可以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部分投入。德国士兵也能加入投入联合国行动的北约大部

队。但是，法院也在判决中坚持，联邦政府在投入德国武装部队之前须取得德国议会的许可。为此只需议员的简单多数。

在德国进行的讨论的中心首先是联合国投入战斗问题。然而，过去几年中，联合国和平行动的绝大部分并非战斗投入。目前的16次和平行动中没有一次是战斗投入。

联合国的和平行动耗资巨大。德国作为联合国第三大缴费者支付联合国正规预算的8.93%以及和平行动预算的8.97%。1995年在

正规预算方面为1.436亿马克（9760万美元），在和平行动方面为4.268亿马克（2.933亿美元）。

1995年联合国预算总计13亿美元。和平行动预算总额达36亿美元。乍一看这可能为数不少。但是，人们要知道，联合国的正规预算例如只是纽约市的年度预算的4%。

如果联合国要卓有成效地确保和平和防止冲突，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为联合国和平行动自愿作出贡献是必要的。联合国没有军队、没有武器，也没有其他的军事装备。显而易见，联合国只能靠成员国准备提供的财政和人员支援行事。

遗憾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天下并不像许多人所企望的那样更为太平。在德国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两年期间，这个机构不得不去对付世界上的25次危机。安理会向17个国家派遣了维和部队。在几乎所有这些危机中，问题都不是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是部分地属于流血的内部争端。而联合国的创始人在1945年主要着眼的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今天毫无疑问的是，本着国际团结的精神国际社会也有责任为解决国家内部的争端作出贡献。

安全理事会 10 个非常任理事国根据一项地区方案每两年选举一次



联合国纽约总部以及世界各地下属组织（像UNICEF或UNESCO等）共聘用工作人员5万多人。大约750名德国人各担任了18 000个较高职务中的一个。

在联合国秘书处大约有2 500个较高级的职务，它们根据一个地区方案分配给成员国。根据这个方案，德国分配到140个位子。实际上，目前在联合国秘书处负责岗位上工作的德国人只有123名。德国的代表人数

大致和法国、英国或美国相同。但是，和来自这些国家的男女相比，德国人却有着求职方面的不利条件：因为只有常任理事国的语言以及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总的来说，德国官员在最重要的组织中的比例约为9%。联合国人员也受到财政危机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年中，联合国仅在秘书处就裁减了2 000多个位子。今天，德国人在一系列最高岗位上工作。



德国人在联合国

曼弗雷德·埃斯勒将军受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委托进行蓝盔部队的结构改革。埃斯勒（图1）以秘书长助理的身份负责规划及支持维持和措施。

卡尔-特奥多尔·帕施克是联合国最高节约检察员。作为副秘书长，他领导联合国内部的检查机构“国际检查署”。1994年11月起，帕施克（图2）同挥霍浪费和营私舞弊作斗争。如他所说，他的目标是进行全面检查，“吓倒违章行为和疲塌作风”。

吕迪格尔·沃尔弗鲁姆是1996年9月在汉堡开始其工作的国际海洋法庭副庭长。这位法学家同其他20名法

官一起，将监督1994年生效的所谓的海洋宪章的遵守情况。海洋法庭是联合国在德国土地上级别最高的机构。国际法学者沃尔弗鲁姆（图3）期待着首先审理海洋法庭面临的对捕捞和保存鱼类蕴藏量的诉讼以及关于限定各国水域的百余次的冲突。

诺贝特·霍尔于1996年7月被任命为联合国驻阿富汗特使。霍尔（图4）在兴都库什山在内战的各派之间进行调解。此外，对他有利的首先是他以往去阿富汗的旅行时建立的多方面的外交接触。在受聘担任特使前，霍尔曾在雅典、休士顿、开罗、巴黎和新德里工作过。

格尔特·梅伦是试图以特使身份平息地区冲突的第二个德国人。从1996年5月起，梅伦领导1994年12月开始的联合国驻塔吉克的观察员使团。

罗尔夫·伯恩克从1996年2月起是原料共同基金会主任，从而是领导联合国一个机构的副秘书长之一。

莱因哈特·海爾姆克是联合国另一位德国的助理秘书长。